

探源者说

高江涛：在4000多年的陶寺探源“中国”



高江涛
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)口述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整理

我是山西陶寺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。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迄今已40余年，发掘面积近3万平方米，为我们呈现了4000多年前的神奇观象台、结构复杂的宫城宫殿和5500余件出土文物。2024年11月，陶寺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开放。

我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陶寺遗址的，2002年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，陶寺遗址纳入其中。那时候我正在考博，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热门知识点，所以从考试的角度知道了陶寺遗址。读博期间，我的实习恰好就被安排在陶寺，后来在陶寺近20年，我基本没有过疲惫感。只要注重细节，考古永远都会有新鲜感。

发现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，和两个实习生密不可分

我在陶寺实习了3个月，正好赶上发掘观象台。当时陶寺考古队只有何努先生一个“光杆司令”，我作为博士生也可以帮帮他。

陶寺观象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，可以观测到包括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在内的20个节气，是陶寺文明最重要的技术创新。这个发现在现在看来重大，但在当时却颇受质疑。

探源工程开展之后，陶寺遗址进行了一次新的勘探。一般来说，考古勘探能够帮助我们初步了解地下的遗迹是什么，比如是一个墓葬，还是一个房子。但勘探到观象台这片区域的时候，只能用个字来形容——“乱”。

这里有夯土、有生土，还有一些垃圾坑。有夯土，意味着可能是个建筑，但是又有生土，是没有人动过的土。当时考古队做了一个决定，干脆把这个不清楚、但现象看起来很重要的地方打开。正因为复杂，才需要探索。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很关键的，但当时把它挖开一看：确实不认识。

在湿润的地面上，考古现象会更容易呈现出来，但是山西的天气干燥。我们常说“春雨贵如油”，春季发掘的时候下了一场雨，考古队就趁着这场雨赶紧拿着手铲重新翻了一遍，现象才清晰地呈现出来——是13块夯土的痕迹。

一块一块独立的方形夯土遗迹，呈一个弧形的阵列。夯土往往是承重的，如果把这些夯土连到一块，那就是一面弧形的墙。但它们又有间隔，这是什么？没见过。考古队只能猜想，是不是像夯土柱子一样的东西。

很巧的是，当时来了一个“实习生”武家璧，他是考古专业出身，当时正在国家天文台做天文学史的博士后，来陶寺考察学习。他有天文学史的知识体系，就不会不自觉地往那方面想。这些弧形夯土部分正对着遗址东边的塔儿山，太阳从那里升起。他就说了一句：“会不会是站在某个点，通过夯土柱的缝看日出的？”就这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考古队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实验考古。

考古队搭了一个架子，模拟夯土柱之间的缝，然后用科技手段计算出一个观测点，架上摄像机，每天记录日出。观测了大半年之后，发现至少有三四个缝可以看到日出的，就推测这是古代的“观象台”。

当时大家都特别兴奋，何努先生也很兴奋，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说了这个重要发现，结果被很多人质疑，说怎么可能是观象台，最早的观象台是元代，“周公观影”还是在西周，4000多年前怎么可能。当时的情景是，天文学史专家觉得八九不离十，考古学家大都持谨慎态度，觉得还不能作论断，也可能就是个建筑。

会议是很务实的，当时提出来的意见



- ① 2011年，高江涛(中)在手工作坊区测绘。

② 2021年，高江涛在宫城区发掘夯土中小墓。

③ 2024年3月20日，陶寺遗址古观象台、气象和摄影爱好者观看“太阳-观测缝-观测点”之间三点一线的景象。

④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，上有疑似文字的符号。

⑤ 2013年，高江涛在宫城西墙解剖剖剖面。
- 受访者供图

受访者供图

视觉中国供图

视觉中国供图

受访者供图

主要集中在两点：第一，观测柱是怎么来的？中间的缝是怎么形成的？第二，实验考古的观测点是今天通过测算得到的，那古人的观测点在哪？

带着这些问题，陶寺考古队又重新发掘，那恰恰就是我去实习的时候。当时我和何努先生讨论，我认为是有先有观测缝后有观测柱。经过解剖结构，我们发现古人是先挖一个很深的基槽，统一夯打到地面之后，把长期观测太阳运转的规律在地上规划出来，形成观测缝，然后在观测缝的外围立起观测柱。这样就印证了推测。当时夯土块往深10多厘米以下，所有的夯土连到了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后人的农业生产再加深10多厘米，我们或许就不可能发现观象台了。

古人的观测点也是我们用手铲刮出来的。当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近圆形的弧形线，里边是夯土，外边是生土，最终发现这个地方有4个圆圈，从外围的大圆逐渐往里收缩，最里边的圆心就是观测点，和我们今天测算出的观测点相差4毫米，古今不谋而合。

所以，我们开玩笑说，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和两个实习生有着一定关系。实际上，观象台历经了2003年春季至2005年春季5个发掘季的艰难探索，经历了许多波折，才最终被大家逐渐认识。

2006年，我博士毕业后，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因为在读博士期间一直协助做探源工程的秘书工作，又在陶寺实习过，我就被正式分配到缺人的陶寺考古队。

考古是偶然，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做桑拿洁具

我是河南开封人，1976年出生。在我读书的年代，比较热门的是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。至于考古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专业，报考的时候也就不会选，所以大多数都是调剂的。1995年，我考上了郑州大学，本报的是行政管理，也是这样被调剂到考古专业。

当时，这个冷门的专业有个说法，叫“专业思想不牢固”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就是想换专业。考古专业是隔年招生，我们这届

就招了15个人，老师希望我们能在专业上稳定下来，还请了很多业界的大咖给我们做思想工作，为了证明学考古有用。

而我第一次从世俗角度感受到考古有用，是在2009年曹操墓发掘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在直播发掘过程，大众普遍关注。当时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，中午吃饭，我们七八个人就在餐桌上讨论曹操墓。餐馆老板看到我们在热烈讨论，就问：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说我们是做考古的。一听是考古的，老板就很兴奋，说能不能给他讲讲曹操墓情况，我们这一桌饭就免单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考古实用，可以换一顿饭吃。

我大学毕业是1999年，那时候已经不包含分配工作了，而且各种用人单位的招聘指标都在缩减。同学们陆陆续续都定了工作，我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。毕业后，我就到“人才市场”去找工作。那会儿大家的观念还是以工作为主，实在找不到好工作，才会去考研。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桑拿洁具的公司，我是全公司学历最高的。当时外地人要办暂住证，公司很多外地人一到晚上就不敢出来，我上大学就迁了郑州的户口，所以我晚上就在公司值班，有时要到一两点。从外地拉回来的货物都是后半夜进市区，我还要跟着卸货，一个桑拿房将近六七百斤，我们五六个人抬。就这样干了3个月，老板说，你不是干这个工作的“材料”，我又回到“人才市场”了。

我的第二份工作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像“传销”，进去就洗脑。当时小组长“洗”了我一个星期，洗服不了我，有点垂头丧气。我也意识到这个公司不太正常，不到两周就走了。这时候已经到了10月，我又失业了。

真正热爱考古的人都会留下来

年轻人毕业时一般都有豪情壮志，要干一番事业，时间长了，就发现有些工作不适合自己，要做比较擅长的工作。

我跟当时的女朋友，也是现在的爱人商量了一下，就开始考研了。大概到了11月，我给开封博物馆投过的简历有了回音，让我去那儿工作。我就一边办入职



手续，一边考研。过了年，研究生考过了。当时的馆长建议我去上学，因为那时候研究生很少，我们那届考古专业只录取了3个，所以我就去读研了，就这样继续走上了考古的道路。

其实经历过田野考古，真正热爱考古的人都会留下来。这就像恋爱的过程，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对方。

考古研究的对象很复杂，但是遗址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，因为关注点很单纯，大家就是做发掘和研究这件事。

过去，考古人和村民的关系也很好，有的技师还在村里认了干闺女。那个年代，村里年轻人多，年轻的考古人在这儿发掘，村民在考古工地上干活儿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时间长了关系都处得很好。今天的年轻人做完工作，就很少和村民打交道了，毕竟不同龄。现在的村民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同志，在陶寺遗址干得最久的村民，断断续续有三四十年了。

在考古工地，我的身份在别人看来是个“老师”。发掘季结束，村民来领工资，有时候还拉着他们的小孙子，见到我都是喊“高爷爷”。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叫爷爷，风吹日晒，人看着显老，其实那时候我才30多岁。有次我跟一个县长开玩笑说，“我可能比你还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”。

考古看似研究“盆盆罐罐”，其实是在“沟通”

对于陶寺古城，我最感兴趣的有两点：一是当年这个城市怎么运转，二是城里的人群是怎样的？这里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、和他们周围同时期的人有没有关系？

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回答的问题，却是把中华文明研究引向深入必须要干的事情。考古看似做的是“盆盆罐罐”，但实际上越来越关注“人”的问题。

我一直很注重考古发掘中与古人的“交流感”。考古不仅仅是一个流程——把器物清理出来，一绘图、一照相，就結束了；而是要带着问题去和考古现象、和古人沟通。只有会好奇、有交流的时候，才可能有细致的发现。

2023年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地穴式房子，发掘中会碰见比较复杂的现象。面对4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，当然不能只是把房里的土剔除、把文物呈现出来，而是要跟古人对话：你在这个房子里的哪个地方休息？哪里做饭？你做饭的时候用了什么东西？你的空闲时间在干什么？有了这个意识，在发掘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精细地去做。比如，其他地面明显进行了烧烤，这一块为什么这么干净，也没有摆什么东西，会不会跟古人睡觉的区域有关？

现在摄影设备很多，但我还是会让学生亲手给文物绘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要一点一点去测量、观察纹饰的特征，甚至要想象古人是怎么画的，彩绘从哪儿起笔、从哪儿收笔，收笔的过程中是哪个地方用力轻、哪个地方用力重……都会考虑到。这样，器物背后就有人存在了。如果在这个器物上看到了这样的画风，在另一个器物上又看到了同样的画风，就会去想是不是一个人画了俩东西。这样是不是很有趣？

探索“地中之国”，提出判定文明的“中国方案”

国外考古判定文明的传统三要素是冶金术、文字和城市，中国经过百年考古，归纳总结了判定文明标准的“中国方案”——生产发展，人口增加，出现城市；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，出现阶级；权力不断强化，出现王权和国家。而这套方案的重要参照之一正是陶寺。

我认为文明是一个系统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，必须抓住这个社会的核心，而不是社会里某一类具体的东西。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和结构而言，王权是最核心的。所以对于国家和王权的探索，就是我们讨论文明的中国方案的核心。

在陶寺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“社会分化”。从1978年到1985年，陶寺在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1309座墓。这些墓葬分区别，又存在大、中、小之别，随葬品也有差别，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地位。这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缘亲疏，而是等级分化的结果，这便不是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，而是“亲不亲，阶级分”的阶级对立了。

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天文学都是文明的天花板，这些知识是只限于很少部分人拥有的。建造观象台这种大规模的建筑，是一个集体行为，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组织。当最高统治者掌握了时间，就能去发布授时，用以指导农业发展，而农业在古代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。百姓按照统治阶级授的时去从事农业生产，就能丰产丰收。

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最为典型的文物之一。更为关键的是，龙盘只出土于大墓或者王级墓葬。从形象上来看，陶寺的龙与夏、商、周及后来的龙有着直接渊源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龙”的雏形。

陶寺的大墓里还出土了一件被认为是文献所载“圭尺”的随葬品，它所测量的夏至日影长度，正是测定“地中”的标准。因为陶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时期，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里的“地中”所在，所以我们推断，这个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“地中之国”，即中国。

我们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还发现了疑似文字。1985年冬，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见到该扁壶的照片和临摹图后，指出这两个“符号”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汉字属于同一个系统。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，不排除陶寺存在文字的可能性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些文字将会比甲骨文早近800年。

目前，我们对陶寺宫殿的发掘，基本上能让我们推测出它大概的样子。它的内墙、外墙都有装饰和彩绘，使用比较多的是红彩、黑彩，还有零星的正彩。只是房屋高度还很难判断，我们正在从建筑的承重、柱子的粗细等各方面来研究。接下来，我们还会进行城内道路、水系的发掘和系统研究。
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持续热映，不少观众发现其中有些“彩蛋”堪称精巧的设计。这类“彩蛋”既是作品的趣味点，也可能是创作者的某种情怀寄托。其实，古代创作者也会在作品中放置“彩蛋”，有些就是作家本人形象的投射。暂不说像《红楼梦》这种带有自叙风格的作品，即便是《水浒传》这类看似视角客观、群像书写的文本，若细细品读，也能看出其中的作者身影。

从宋江的职业身份和思维方式来看，施耐庵很可能对宋江有一种精神投射，但这种投射未必都是正面的，更趋向于一种将自我客体化之后的批判视角。

从全书显露的书写历史的宏大气象来看，可以想象施耐庵在青年时代，大概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，面对元末乱世，他仍希望保证自己的节操。这种观念在宋江身上，就是他忠于君主、义对兄弟的一面。但施耐庵大概也有过宋江那样做刀笔吏的经历，对人性的晦暗与江湖的凶险有深刻认知。这也导致在底层挣扎的宋江等角色，总有一股草莽之气，缺乏优渥生活赋予的“体面”与“淡然”。

对于宋江在朝廷面前摇尾乞怜的做法，施耐庵的态度其实是有些暧昧的：一方面支持，否则就无法成全梁山的“忠义”了，成功招安是洗白梁山好汉身份的唯一渠道；另一方面，施耐庵又深知朝廷是不可能真正给梁山一个好归宿的。这种复杂的心理，体现在宋江身上，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形象。当然，宋江不可能是施耐庵自我投影的全部，应该还有其他“分身”。若从职业相关性来看，“铁面孔目”裴宣可能是施耐庵的形象投影，他因为断案刚正不阿而得罪了官府，无奈之下才落草梁山。施耐庵非常擅长书写刑狱故事，恐怕与他从事过类似职业有关。在这一点上看，裴宣确实可能是施耐庵在小说里安排的一个“彩蛋”角色，作者“潜伏”在自己创作的角色之间，与那些人物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但是，裴宣在书中的“戏份”实在太少了，更有可能是施耐庵自我形象投影的是“金眼彪”施恩。

施恩是一个很好的“潜伏型”角色。首先，施恩在《水浒传》里可以说不重要，也可以说很重要。重要性在于他是在“武十四”里出现的关键角色，他善待被关在牢城营里的武松，又让武松去帮看打蒋门神，夺回快活林。然而，除了在“武十四”里，施恩确实没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了，他上梁山之后，更是表现平平，最后在征方腊时落水淹死，结局也相当潦草。

如此设定，很像一些文学大师的“炫技”之作，在轻描淡写之时，顺便点到施恩这个角色的命运，而当读者以为作者要重点讲述施恩的故事时，又让施恩附在武松身后，仅仅作为主角的“背景板”登场。

再者，施恩算是施耐庵的老家，梁山好汉里只有施恩施氏。而排除《宋史宣和遗事》等蓝本里早有的人物设定，那些来自施耐庵原创的人名，大多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比如，《水浒传》开篇不久就登场的3位好汉的名字——“神机军师”朱武、“跳涧虎”陈达、“白花蛇”杨春，这个组合很像元末明初3位改天换地的大人物——朱元璋、徐达、常遇春。类似的设计还有“百胜将”韩滔、“天目将”彭玕对应的“韩彭”——在汉初赫赫有名的韩信、彭越，两人在历史上就常被并称，施耐庵便借用了《水浒传》。

顾名思义，施恩就是施加恩惠，在江湖里，就是扶危济困，仗义疏财，很讲义气。施恩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武松，武松入狱后，施恩上下打点关系，还不断看望武松，给他精神安慰，可谓散尽了钱财，也用尽了心思。武松也确实是个值得接受恩惠的人，有恩必报，有仇必复。后来征方腊时，武松听闻施恩战死，泪如雨下。武松在《水浒传》里只为了3个人哭过，第一次是因思念宋江，第二次是为武大郎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，则是为了施恩。由此可见，施恩对武松是极其重要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施恩与武松的形象互为映衬，由施恩来写武松，也是《水浒传》的一条暗线。施耐庵借助施恩的名字与形象，表达自己对忠义精神的认可，特别对乱世之中仍有道义感的人，他是非常敬佩的，而武松就是这样一光明星落的角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施恩的战力很弱，更像是一个渴望身居书斋却不得不混迹江湖的文人，只能靠依附权力或武松这样的强悍角色来生存。如此设定，是否是施耐庵对乱世中的文人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隐喻呢？

施耐庵把自己写进了《水浒传》？

□ 黄 帅



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衙的官箴碑。 纪录片截图

□ 于虔哲

官箴，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用来警示自己以及同僚、继任者们的文体。一般读者更熟悉家训、家规，但家规世也很重视的是治家之道，讲求的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个人修养。与家训不同，官箴注重的是为官之道和士人精神的塑造与传承，代表的是古代官员士大夫的精神，是历史上又一个坚定的文明脚步。

近日，七集系列文化微纪录片《中国官箴》(第二季)播出，让大众的视线聚焦到传承千年的官箴文化。节目透过官箴典籍、文物实证、历史人物故事，梳理古代官箴发展脉络，讲述官箴经典的缘起、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。当这些书之典籍的道德训诫，穿越千

年叩响新时代时，一场关于精神标杆的跨时空对话就此展开。我们清晰地看见：古人的精神标杆正在当代人的修身实践中完成创造性传承。

官箴起自何时已经不可考，我们只知道这种文体在西周就已存在。《左传》说：“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阙。”所谓大史，史官之长。辛甲曾是商纣王之臣，深知商朝的腐朽败坏始自从王到臣下的精神堕落，希望新兴的周王朝汲取教训，树立为政的道德规范，于是百官皆作箴。

官箴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，它不是法律，不是强制性规范，那么是否可说是一纸具文呢？

不能。

它是历代官员们的精神标杆，更是修身立德的指引灯塔。“取法于上，仅得为中；取法于中，故为其下。”这句话就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后世的《帝范》十二篇，堪称最高等级的官箴。

我们为什么始终要树立榜样？我们为

什么始终要有精神标杆？因为只有有了榜样和标杆，才知道方向在哪里。每个时代都有堕落的人、“现实”的人，但历史不是他们推动的，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“胸中有光明，眼前有标杆”的人推动的。官箴和家训的存在，就是告诉人们——理想尚在，目标尚在，让我们取法于上，知道方向，知道对错，哪怕仅得其中，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。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，善在哪里？官箴就是其一。

它是中国人的精神高地，亦是砥砺品行的精神基因。纪录片其中一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东晋吴隐之在前往广州履新的途中，路过一处泉水，当地传说喝了此泉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，故名“贪泉”。吴隐之认为，人有贪欲才有行为，与水无关，毅然喝下此水，并在秉政期间坚持廉洁。这个故事展现了有操守者的自信，代表着士大夫的精神诉求。

在古代的生产力和教育背景下，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。官员们奋发有为、朝乾夕惕，是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标志。官箴体现着君子之风，体现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的持守，体现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。

托名汉代马融的《忠经》中说：“为国之本，何莫由忠？”汉贾谊《新书》：“政莫大于信，治莫大于仁。”宋陈襄(传)(《州县提纲》：“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。”宋吕本中在《官箴》中提出“清、慎、勤”为官之要。明薛瑄《从政录》：“大丈夫以正大立心，以光明行”。

清张伯行《却赠檄文》说：“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”《戒石铭》说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易民虐，上天难欺。”这句箴言，体现着忠、仁、信、廉、公，它标志着我们整个民族抵达的精神高地。

它是治政得失的经验积累，恰为当代人的处世指南。历代官箴，除了为官原则的表述，还有很多为政经验的传递。例如交友，“君子不党”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行为准则。清石成金《董身要法》：“居官惟以寡交为第一法。”在《中国官箴》(第二季)的《择交》一集中，包拯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。

包拯在年轻时便展现出极高的道德标准。当他与同学在庐州兴化寺苦读时，面对当地富家翁的多次邀请，他坚持拒绝，认为与其交往可能会带来日后的麻烦。这种谨慎的态度，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同样，在科举入京时，尽管与宰相吕夷简住在同一里巷，包拯没有主动攀附，而是选择离京赴任。古今为官望落者，很大一部分始自于交友不慎。寡交、慎交，这是防患于未然的不二法门。

回望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官箴，它展现的是民族“来时路”上的一个个脚印。它不是具文，某些条文也许已经过时，但其精神内核，永远是民族的精神瑰宝。提炼精神，指导方向，这恐怕才是我们现在重拾官箴的意义所在。青少年时期正是价值观念养成阶段，正是树立标杆、攀登精神高地的时候，官箴不仅能给青少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，更能传递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。

(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)